

# 走进常委会工作报告的临时发言

## ——余焕春委员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波折

汪东林



本文作者汪东林自一九六二年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长期担任小组秘书工作。一九八二年参予《全国政协报创刊筹备具体工作》图片,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前排左一)在一九八六年秋天工作会议后,向汪东林(时任人民政协报编委、新闻部主任)面授关于进一步办好人民政协报的四点指示。

1978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第一次会议闭幕,停顿十余年之久的人民政协工作开始全面恢复。

文化组(即今之专委会)是五届全国政协开展经常性活动的13个工作组之一,组长是周扬,副组长是张香山、魏传统、陈翰伯、姜椿芳、林默涵,拥有文化、艺术、新闻、社科等方面知名人士。我从学委会办公室临时借调过去当小组秘书,参加记录工作,小组秘书组长是张永年同志。

自1978年4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政协文化组敢于触动一些当时十分敏感的话题,其中,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是最突出的一桩大事。

### 余焕春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文化组的漫谈会一开始出席率高,发言踊跃,全组成员70余人,每次到会都在50人以上。

1978年6月8日,文化组在政协礼堂东厅召开例会,原定内容是由周扬向委员们传达结束不久的第五届全国文联大会的盛况。传达结束后,第一个举手发言的是人民日报社记者余焕春。他的表情严肃而又沉重,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边讲边念:(以下是笔者的记录)

我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人民日报受“四人帮”的控制、指挥,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人民日报的同志在一年多之前即1976年12月就写出题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报送中央。时至今日,尽管中央已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如所谓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已出来主持工作了,许多无辜被捕的同志已经得到释放和平反等等,但整个事件本身并没有平反,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也没有一个公开明确的说法。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关注这桩大事的拨乱反正,他们要我到政协会上来呼吁呼吁,我就来了,我本人也有此强烈的愿望。由于我是政协委员,政协是广开言路的地方,又是内部的会议,我认为敞开发言是无妨的,有积极意义的。

余焕春的发言,组长们事先不知道,他们来不及讲几句表态的话,会场就响起一阵赞同的掌声。

掌声一停,余焕春又讲开了,因为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关心的大事,而会场又在政协礼堂常有别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穿行的东大厅,因此会场的人数不断增加,竟然多达七八十人,不少人是站着听的。

余焕春说:(以下根据记录还原)

1976年天安门事件自然要从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病逝谈起。

1月9日早晨,周总理病逝的噩耗在电台广播后,全国人民立刻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当天,姚文元即指示,《人民日报》对总理逝世除发通稿外,没有其他报道任务;各国电台“不能占版面太多”“标题要少”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设灵堂”,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的字样,等等。

11日,姚文元下令改变《人民日报》原来以整版篇幅发唁电的安排,硬压缩为半个版,另半个版用来刊登《文化大革命端正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姚文元为此电科研方向(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再次强调“不要突出总理”“不许刊登广场群众悼念的场面”“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多登些抓革命促生产方面的东西”。

14日,是举行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已达到高潮,首都上百万群众去天安门广场寄托哀思,但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从一版到三版竟没有出现一个周总理的名字,而在头版头条,则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通讯报道,文章一开头竟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弥天大谎自然激怒了正处在巨大悲愤之中的人民群众。

14日这一天,报社从早到晚接连不断地接到广大读者的抗议电话,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报道人民

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指出代表人民群众心情和愿望的绝不是什么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而是人民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哀思。有的电话甚至痛斥《人民日报》倒行逆施,已经不是党报,不是人民的报纸了。但姚文元却得意地说:“这是一篇在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鲁瑛等人还将广大读者来电话的记录整理内部情况报送姚文元,姚文元删去群众对报纸提意见的部分,集中保留对报纸声讨的词句,并冠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的标题作内参印发,并且上升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实际上是着手镇压群众制造舆论。

余焕春的发言,一开始就吸引全体与会者。历来气氛比较自由活泼,插话甚多的政协文化组漫谈会,这一次变得非常严肃。

余焕春继续发言说:

到了清明节前后,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再一次掀起高潮。从南京开始,迅速遍及全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再一次成了小白花和花园的海洋,那一批批从早到晚不间断的悼念队伍,那一篇篇匕首般锋利的诗和悼文,使“四人帮”如芒刺背,如坐针毡,王、张、江、姚一齐出动,策划制造了一个大阴谋——将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反革命事件。

从1976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张、江、姚给鲁瑛打电话24次,多时一天3次。

接着,余焕春读了几页纸的人民日报电话记录,其中有很多是姚文元、张春桥等对当时《人民日报》版面的具体指示。

余焕春接着着重回忆了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社的情况:

4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这篇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报道。尽管当时对天安门事件已经定了案,邓小平同志已经被罢了官,是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广大读者仍然不畏风险,他们不仅把这张《人民日报》撕碎寄回报社。而且有的在一版上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从今改为:“法西斯机关报”;还在信封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作者注)。

余焕春委员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会儿,才转换口气继续说:

我今天在这里向各位委员披露上述情况,是因为不论当时还是今天,许多同志都认识到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而不是反革命事件。但“四人帮”把它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究竟搞了多少阴谋诡计,许多同志并不十分清楚。我认为要揭露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有两个单位责无旁贷,一个是人民日报,一个是北京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情况我不直接了解,但人民日报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是作了清查,并把核实的真实情况向党中央反映了。今天,如前所述,天安门事件事实上已经搞清楚,党中央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但对于这个事件总的政治性质,至今仍没有彻底平反!……我个人的看法和期望,是尽早彻底翻案、平反,把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件,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载入史册。看来,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再一次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多呼吁,多奔走,为促进

尽快彻底解决这一大事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我的话就到这里。

一阵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再一次对余焕春委员的发言作了肯定和赞同。

此时会议时间已超过,但委员们还抢着说话。科学家孙家昶颇为激动地说,近年来出差外地多次,无论到哪里总有人问起天安门事件怎么解决,问的答的都很有感情,可见这件事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我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四五”运动可以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不把这一事件搞清楚,就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孙家昶委员提出建议,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词,应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不是现在的由群众和各单位出版的“诗抄”。李初梨、杜任之等老同志都纷纷发言,虽然话讲得不长,但态度明朗,都对余焕春委员的意见深表赞同,认为政协应该为此事呼吁。平时发言不多的红学家吴世昌委员还建议,政协应成立一个“天安门冤案平反委员会”,把这个大事件彻底查清楚。

6月8日政协文化组漫谈会的结果是:责成办公室小组秘书组长张永年编写简报,将会议情况向中央反映,尤其是余焕春的发言,要详尽些,其他委员的若干意见、建议也不要遗漏。

第二天还有委员给办公室打电话,要求再开一次漫谈会,让大家继续议论。

### 政协感受到了压力

文化组漫谈会后不几天,一位副秘书长把我找去问:6月8日文化组的会是谁主持召开的,事先安排的是什麼内容,是谁让余焕春发言的?我一听,就知道不好了。但是,政协反映会议情况的简报刚刚印好,一份还没有发出去,何以上头这么快就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呢?不容多想,我便如实讲了事情的经过。

副秘书长指示:一、印好的简报一份不外发,立即送一份给他阅看;二、把6月8日这次会议的情况,尤其是余焕春的长篇发言怎么来的,照刚才讲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写一份详细报告。

我临走时问了一句:“这报告是政报领导要,还是别的地方要?”副秘书长沉思了一会才严肃地说:“我一听你说我们的简报还没有发出,心里放松了一半,何况据你所说,余焕春的发言内容组长们事先不知道,政协其他领导也事先不知道,那么我们的责任主要就在于讲明情况了。我也是上边来查问才知道的。除了文化组的组员们及政协的有关干部,有没有其他单位的同志参加,有没有新闻记者?”我回答:“这种内部的例会不通知新闻单位,除了政协工作组办公室的干部,还有中央统战部的那天来听会的同志挂电话,该同志简单地讲6月8日会后,当天他们一回到里就写了简报,送部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听说现在上边有反映。”

我刚才放下电话,正端坐在办公桌前构思这份会议情况报告怎么下笔,电话铃又响了!没料到,是余焕春。他问:那天文化组的会是不是政协写简报反映过了,看一看简报,行不行?我回答:简报正在写,还没写完。余焕春颇感意外,说:“这就奇了,今天我的顶头上司已把我找去问情况并查看我在政协漫谈会上的发言稿了,他虽然说稿子内容

没有什么,但他们的神色告诉我,可能因为我的发言被批评了,他只是简单对我说了一句话,‘不管谁找你查问这件事,你都如实报告。’”余焕春说:“话是我讲的,无论如何都由我负全部责任,与他人无关,更没有你们政协的事。我是政协委员,我要讲什么,自然是自己负责。”

我随后给领导送去一份简报。领导接过去看了一眼就问,这简报有没有清样?回答有。领导又指示,情况报告写好后再附上简报清样,印好的简报先封存在办公室等候处理。

我很敬佩领导的细致,往上送未付印的清样和送印好的简报,是不一样的,一个于部处理事情的水平高低常常表现在这些细微处。这撰写情况报告的重任还压在我身上,眼下已无心思想。当天,我没有吃晚饭,和张永年同志一起又开了一个夜车,三易其稿,才在第二天清早上班,把一篇不足1000字的情况报告和简报清样整理了出来。

### 谜底半年后揭开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这件事一直没有下文,领导也没有再来查问。一个多月后,在一次例会上,周扬询问我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我如实报告。周扬听罢说,政协就是广开言路的场所,一个政协委员,就有权利在会上说话,对与不对,都可以向上反映。领导者的责任是择善而从之,用不着对不顺耳的话大惊小怪的。周扬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周扬的话也表明,他不是一般的耳闻,很可能也有人查到他那去了。

两个多月后,我才得知,是中央统战部乌兰夫部长派人到政协询问6月8日文化组会议的事的,而乌部长是奉上海头的指令。乌兰夫当时是政协副主席兼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谁给他下指令的,我们这小组秘书是不敢打听听的。

谜底终于在事发半年后,即1979年1月的中央理论务虚会上,在中央四大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联合发言中被揭开。

原来,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1978年6月中旬看到中央统战部的简报后,立即把这四大单位的负责同志找去,就当时新闻宣传工作讲了一番,随后把话锋一转:6月8日的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对天安门事件说了一大段话,认为这个案没有翻过来,一定要翻过来,彻底平反。天安门事件的事,这一年多许多问题已经解决了,你还要翻,翻谁呀?这个余焕春还说什么,天安门事件这个案不平反,人民心不平;甚至说,翻案会使毛主席的旗帜更加鲜艳。你一个共产党员,党报的记者,能这样说话吗?况且是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上,你的钱锺书哪儿去了?

这就是1978年6月中旬发生的,追查政协文化组会议事件的来龙去脉。

1978年12月,天安门事件终于由中共中央决定彻底平反。在1979年6月召开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大会审议通过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则把文化组这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的小组会作为一项政协工作的成绩列入其中。

应当说,这个风波,不过是当时“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间尖锐对立和斗争的一个注解。

(本文作者汪东林自1962年至2004年在全国政协机关连续工作40余年,曾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是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梁启超的坚韧

姚秦川

1916年11月,34岁的蔡锷因病去世,梁启超为了纪念自己的学生,遂在上海发起设立松坡图书馆(蔡锷字松坡)。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筹建图书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关键的便是“集腋不易”。

为了给松坡图书馆筹款,走投无路的梁启超打算“写字”卖钱。每天吃过晚饭后,梁启超先是休息10分钟,然后抽支烟,于19点钟准时开始写作。如果哪一天有事耽搁没写,第二天他必会早早起床,将头一天的认真补上。因为梁启超文字功底深厚,一个大字可以卖8块钱,每月可得两三千元。

不过,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想要建立一座图书馆可谓难于上青天,这一点梁启超当然也心知肚明。1923年,梁启超上书时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再次提起筹建图书馆的事情。不久,黎元洪下总统令,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作为馆址。当年11月4日,松

坡图书馆正式成立,梁启超出任馆长。不过,图书馆虽然建设好了,但如何维持图书馆的正常开支和员工生活,又成为摆在梁启超面前的一道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梁启超除了多方奔走借垫外,甚至还将自己的人寿保单拿出来,向信托公司抵押借款。而图书馆接待外宾的费用,也一度从个人薪金中支付。

因为工作强度太大,梁启超身体健康逐渐出现问题。不过,他在给儿女们的信中,依旧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他的雄心壮志,还特别强调要借此培养人才:“我要放我心血在里头才能成,尤其要训练图书方面的人才,非我亲自出马不可。”字里行间,让人真切感受到梁启超为了图书馆事业不遗余力地奉献与付出,读来令人心酸与动容。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的次女梁思庄后来成了著名图书馆学家,也算了了父亲的一桩心愿。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闻一多教侄有术

张雨

1932年8月,闻一多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期间,他大哥闻展民的独子闻立勋从武汉大学转入北京辅仁大学读书。对于侄子的到来,闻一多很是高兴,对他寄予厚望。然而,闻立勋则对学习不感兴趣,经常贪玩,花销自然不少,因此,家里寄给他的钱总是不够花。

闻立勋难为情向家里要钱,因为家里每次寄给他的钱都超出他正常需要的钱数。他也难为情向四叔闻一多要钱,因为自从他来到北平,闻一多没少给过他钱。经济拮据的他居然萌发了一个不良之策。他发现四叔闻一多每次到财务室领取薪水时,用私章在会计那里盖一下就可以,并不用亲笔签名。于是,他算计着清华大学发薪水的日子。发薪那天,他就偷偷拿着闻一多的私章,到财务室去冒领薪水。不巧的是,会计发现这次私章与闻一多平时用的不一样。就委婉地说:“小闻呐,今天钱不够了,明天再来领吧。”

没有领到钱,闻立勋又偷偷地把私章放了回去。下午,会计恰巧碰上

闻一多,问道:“闻教授,今天怎么搞的呀,让侄子拿一方闲章来领薪水?”闻一多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连忙说:“真是不好意思,我太大粗心了,拿错了章。明天,再让立勋过去领吧。”

回到家里,闻一多没有斥责闻立勋,而是把他叫到书房后关上门,心平气和地说:“立勋哪,你看,我领薪水是用这枚印章,你却拿了我作画时用的章。我和会计说好了,明天你拿这枚章去领薪水吧。”说着就把那枚印章递到了立勋手中。

闻一多这样讲,闻立勋顿时羞愧难当、面如红布,他低着头有些哽咽地说:“对不起,四叔,我错了!”闻一多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嗯,知道错了就行,你还年轻,有句话说‘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今后缺钱花跟我说一声,以后要在学业上多下些功夫,我相信你有出息。”

闻立勋深深体会到四叔的良苦用心和信任。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勤俭节约、发奋学习,不辜负四叔的殷切期望。多年之后,闻立勋没有让闻一多失望,他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刘半农自题画像

崔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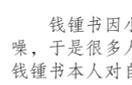
1934年初,北平美术学院校长王悦之为刘半农画了一幅画像,画完后刘半农请客,但画像仍需要加工,所以没有拿走。1934年3月23日下午,刘半农到王悦之住处取回画像。

5点后,刘半农来到北大二院,出席北大为招待教育部专员开的茶话会。专员5人,其中有两人是北大毕业生,一人是旁听生。刘半农戏称“女儿回娘家”。大家喝茶,刘半农喝白开水。上次在茶话会上,刘半农朗诵打油诗6首,发音太大,加剧了胃黏膜发炎。他的私人医生梁大夫叫他服药禁茶。

当晚,刘半农吟诗《自题画像》云:

名师执笔美人参,画出冬烘两鬓斑。两眼注明劳碌命,评头未许穴窿钻。诗文讽世终何补?磊块横胸且自宽。蓝布大衫偏窃喜,笑看猴子沐而冠。

“美人参”指王悦之画画时,有女画家金耐先在旁做参谋。“两眼注明劳碌命,评头未许穴窿钻”,指自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 钱锺书有自知之明

周星

钱锺书因小说《围城》而名声大噪,于是很多人开始上门求字。虽然钱锺书本人对自己的才华有足够的自信,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书法家”,甚至对自己的字都不够自信。

有一天,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余英得得知钱老因患病很久没有痊愈,就偕一友人登门拜望钱锺书。这位友人素来仰慕钱锺书,听到能见到他,非常兴奋,准备利用这次机会向钱锺书求一幅字。

在钱锺书家中大家聊得非常投机,友人指望钱锺书在聊到兴头时能实现他的愿望。正聊得兴起,只听钱锺书突然大声说道:“什么‘钱学’?这个简直是笑话。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把我捧成了玉皇大帝,让我跟孙悟空和托塔李天王一起称兄道弟去了。”钱锺书这番声色俱厉的批评让在场的人为之怔。原来当时社会上有了专

门研究钱锺书的“钱学”,这是当时我国第一个还健在的学者就有专门研究自己的机构。钱锺书知道了非常愤怒,所以才有了上面一番言论。

听完钱锺书的话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又听到他继续吐槽心中的愤恨:“认识我的人和不认识我的人,每天都有人络绎不绝来敲我的大门,给我来信来函的也多如牛毛。不外乎是那套套路:先是把老朽我称颂夸奖一番,随后就是露出其本来面目——要我题词、作序言、审阅文章。如此而已。”说到这里,钱锺书长叹了口气:“竟然还有人褒奖我是书法大师!我的字还不如我家杨绛先生。我都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了,你们说我怎么应付?我哪里又应付得了这些事儿啊!”

钱锺书说完这些话后,余英英和他的友人只能相对望了一下,不敢再开口提这个要求了。